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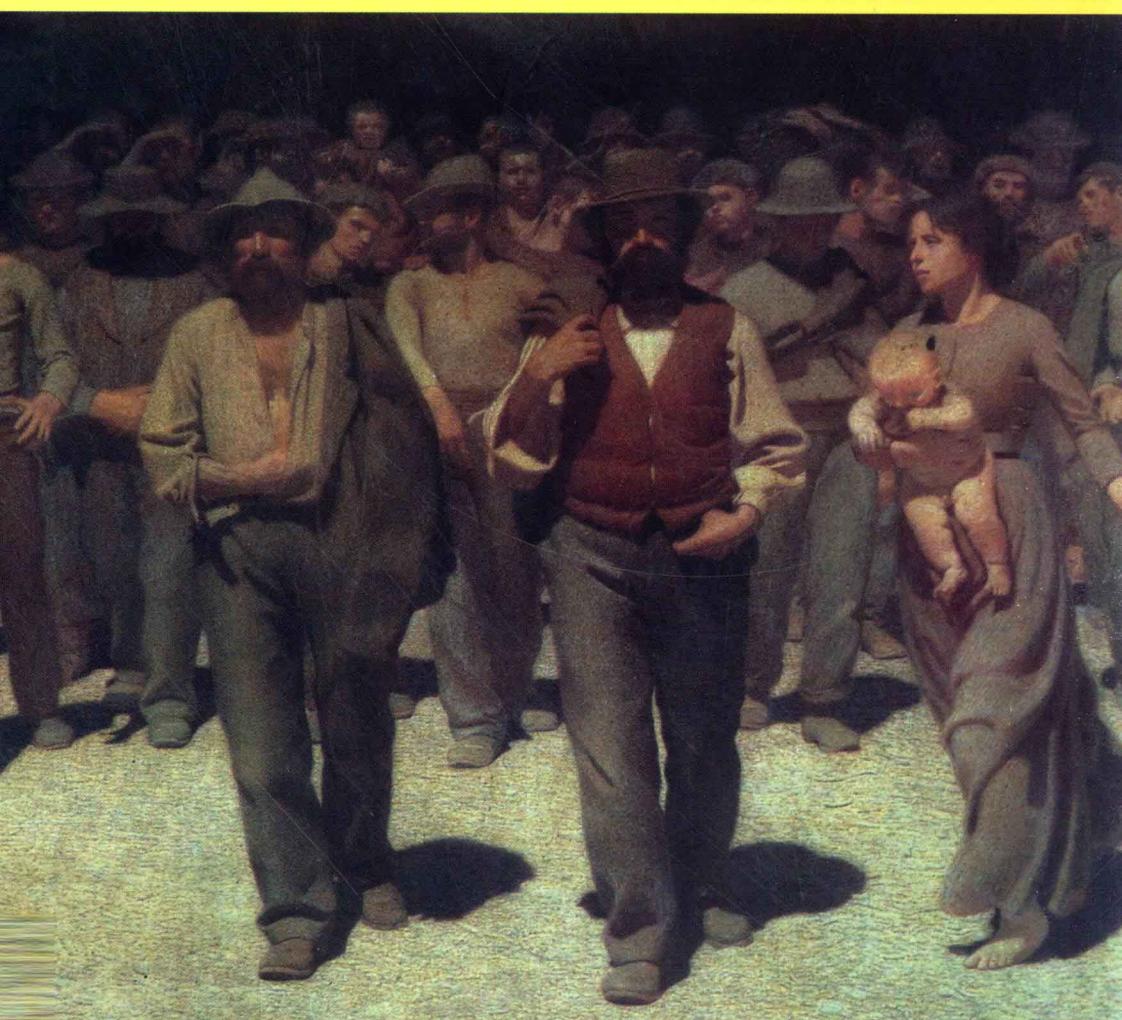


[英] 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著
姜 辉 于海青 庞晓明/译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上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⑯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上册)

[英] 唐纳德·萨松/著

(Donald Sassoon)

姜 辉 于海青 庞晓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上、下册) / [英] 萨松 (Sassoon, D.) 著;
姜辉, 于海青, 庞晓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19)

ISBN 978 - 7 - 80230 - 881 - 7

I. 欧… II. ①萨… ②姜… ③于… ④庞… III. 社会主义—
政治思想史—欧洲—20世纪 IV. D09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2246 号

© 1996, 2007 Donald Sasso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 B. Tauris & Co. Ltd, London

本书根据伦敦 I. B. Tauris & Co. Ltd 1996 年版本译出, 英文原版书名
为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 顾 问** 陈奎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华秋 原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戴秉国 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党委书记
王家瑞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张全景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郑科扬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原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
韦建桦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 主 任**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级编辑
- 副 主 任** 吴恩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王学东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郭业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田心铭	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教授
李红旗	新华社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

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研究室主任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王金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王立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研究员
王挺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王一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王振亚	陕西师大政经学院院长、教授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研究员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华玉武	北京农业学院政法系系主任、教授
刘书林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任治君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孙海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编审
孙锦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

- 许兴亚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 许征帆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朱炳元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 庄前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 陈学明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占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 陈之骅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历所研究员
- 谷源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经政所研究员
- 何秉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研究员
-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李炳炎 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 李崇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 李汉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研究员
- 李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 李其庆 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译审
- 李兴耕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 李萍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 余志远 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宋晓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研究员
吴雄丞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教授
杨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高级经济师
张国祚 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海滨 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副研究员
张再兴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房广顺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罗文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部主任、研究员
武兆令 教育部社科中心教授
周肇光 上海金融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周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胡振良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共运室主任、教授
姜述贤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赵存生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高永中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所副所长、《党建研究》杂志主编
高 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杂志社总编、研究员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 桑玉成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徐崇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 徐世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 崔耀中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团长
- 黄浩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研究员
- 黄金辉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
- 黄晓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编审
- 黄 宏 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 梅荣政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教授
- 董京泉 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
- 董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副所长、研究员
- 董正平 首都师范大学经管系主任、教授
- 蒋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研究员
- 温伯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 谢寿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 靳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 樊建新 教育部社科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特邀研究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淑杰	丁原洪	马维先	马 艳	么素珍
孔田平	毛相麟	王京烈	王少先	王振华
王正泉	冯绍雷	田春生	叶卫平	纪 军
江时学	刘淑春	刘元祺	曲 伟	全林远
许 华	许 新	朱安东	李凤林	李福川
李民骐	李润海	李正乐	李 漫	沈宗武
苏振兴	汪亭友	吴国平	吴 波	肖 枫
杨会春	杨祖功	杨 斌	杨 双	余文烈
张守华	张树华	张铁柱	张西明	张玉良
张中云	张 记	张 捷	金立群	金熙德
罗云力	庞大鹏	庞中英	周穗明	周新城
段启增	胡俊卿	姜 辉	姜 琳	俞 遂
赵常庆	赵 实	钟亚平	柴尚金	高增杰
高 歌	高 洪	高 渝	顾钰民	郭建平
郭元增	唐修哲	徐海燕	曹长盛	曹苏红
阎志民	葛新生	智效和	裴远颖	潘德礼
潘金娥	薛福岐	魏永旺	魏 伟	

关于本书

唐纳德·萨松出生于开罗，先后在巴黎、米兰和伦敦受教育。他在伦敦大学的玛丽王后·韦斯特菲尔德学院讲授历史学。作为英国著名的学者、比较欧洲史研究专家，萨松著述甚多，影响广泛。《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一书获1996年伊萨克·多伊彻奖，美国和欧洲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将其作为学术教科书使用，奉为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之作。此外，萨松还著有《当代意大利——1945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等。

对《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一书的更多评价：

一部了不起的杰作。……萨松以令人惊异和艳美的渊博，一贯强调不同国家先存的文化使社会主义工程在每个国家都各具特色。……该书是一部小型杰作。它信息丰富……结论明睿……我还从未如此相信一本书能够这样长期成为权威性的著作。

伯纳德·克里克 (Bernard Crick)

一项令人惊异的成果。《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内容丰富、涵盖广泛、浓缩精炼、可读性强，在结论和知识上精妙锤炼，它成为经常的灵感源泉。

雨果·扬 (Hugo Young)

“我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阅读了这本书，一点不觉得冗长啰唆。读了萨松的精彩论述之后，感到那种轻率的资本主义胜利之说同早一代

天真的关于社会主义太平盛世之论一样，都是历史误解。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

唐纳德·萨松以轻松雅致的笔调，展开了他那万花筒般的叙事。他以娴熟的技巧，引导读者穿越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工业发展、外交和战争问题等等，这些塑造了欧洲社会主义的百年历史。

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

令人钦佩的著作……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这本书是了解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政府发展历史的权威性指南。不仅涵盖较大的西欧国家，而且也涉猎了许多较小的国家。

托尼·朱迪特（Tony Judt）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这部关于欧洲左翼的全景式历史，从奥斯陆到雅典，从1900年到1995年，自始至终充满着吸引力。作者攀登了一座学术山峰，回来后收获了一本资料丰富、洞见睿智的不可缺少的著作。

诺曼·伯恩鲍姆（Norman Birnbaum）

《政治季刊》

一部引人注目的著述。

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

《金融时报》

唐纳德·萨松以独特风格和同情心，重新叙述了西欧左翼的历史。这不是关于革命的历史，而是关于改革的历史。

斯蒂芬·廷代尔（Stephen Tindale）

《前景》

有说服力的著作……是当下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聒噪时髦话语的解毒剂。

《费边评论》

本年度的重要政治著作……萨松对延续一百年、涵盖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提供了非凡的广角聚焦。

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

《新政治家》

一部杰出的学术著作。

托尼·本（Tony Benn，国会议员）

《BBC Radio 5 直播新闻访谈》

一本新的历史分析名著，它不久就会成为经典之作。唐纳德·萨松这本明晰、广博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深刻揭示了……任何有成效的左翼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共产主义政党（在诸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情况）……必须要对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无方向的动力机制进行调节，使之社会化，而不是取代它。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卫报》

一部宏伟的著作。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如此精当的观察探究。……笔调新颖，讽刺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阅读此书，会有无尽乐趣。

《经济学人》

一部史诗般的作品……百科全书式的比较性研究著作。作者从英国、德国、希腊、丹麦、芬兰等不同国家的历史中熟练自如地取

材……它的巨大力量在于，作者把左翼一右翼的意识形态之争置于资本主义体制变化和发展的环境中深入考察。因而（萨松）这样说，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击败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变化而加剧的。

艾伦·汤普森（Alan Thompson）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萨松的观点基于非常广泛的阅读和知识积累。而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决不会感到陷入杂乱无序、生硬不当的繁琐细节沼泽中，也不会感到本书提供的知识缺乏生趣和智慧……这是一项惊人的成果，理当成为一部社会主义历史的经典。

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

《论坛报》

萨松的书是非凡的。内容丰富和思想新颖的很好结合，使它称得上是一部经典之作。在英语语言中，还没有多少著作达到这样的水平。

戴维·马昆德（David Marquand）

中文版序言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 年出版的著名作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作者）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① 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 V. V. 博韦弗莱洛夫斯基（V. V. Bervi-Flerovski），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

^①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革命的根源》), Grosset and Dunlap, New York 1960.

业化。^① 这样的先入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②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① Edmund S. K. Fung, “State Build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Social Democracy in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1921 – 1949” [《国家建设、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正义——中国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民主（1921 ~ 1949）》], in *Modern China*, Vol. 31, No. 3, July 2005, p. 325.

② Kees Blockland, “Peasant Alliances and ‘Concertation with Society’” (《农民联盟及其“社会合作”》),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4, No. 2, May 1995, pp. 159 – 170.

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整个 80 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

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 19 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本书集中关注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即被人们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发展型或现代化型的社会主义同作为资本主义调节形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远远不止于此。在前者那里，无论是苏联还是古巴和朝鲜，都呈现出集权的特征，而且不容忍不同政见和多元化，其程度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集权统治，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同民主、多元化和人权共存。这样的比较经常由社会民主主义人士自己做出（也是合理地做出），他们认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专制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让人相信，但留下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便在西方，在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至少是在初始阶段，从来就没有同 20 世纪晚期意义上的那种完善的民主和人权伴随过。在英国或美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选举权被严格限定或根本不存在，自由也被严格限制，工会被取缔或受到严格的控制。^① 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过程伴随着奴隶制和种族灭绝（如美国）、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严苛的权威主义（例如日本）和一党统治（例如直到现在的韩国）。充分的民主和人权只是后来才确立的。换言之，它们是政治斗

^① 关于 20 世纪前半期欧洲民主之脆弱基础的论述，参见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黑暗的大陆》), Knopf, New York 1999。

争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必然伴随物。社会民主主义，在它充分存在的地方，就站在为民主和人权所做的政治斗争的前线，驱策着当时不很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勉强算是民主的保守主义政党，朝着政治改革的方向迈进。

社会民主党人是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才上台执政的，这与共产党人不同，后者在执掌权力之后，面对的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例外，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因此，对 20 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它们的意识形态是由其所属的那种社会以及它们同政权（也就是国家）的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并且民主成为主要政党的共同财富的时候，才能够上台执政。共产党人则必须建立起一个工业社会，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要管理这个社会；共产党人在不太发达的社会取得成功，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做得好。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面对的一个悖论是，管理市场社会的观念并不是西方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内容，尽管这是他们一直做着的事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短期要求旨在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管理劳动力市场，建立福利国家。对文明生活的最低标准的界定，不应交由市民社会领域（也就是市场的自发决定）去做，而应成为政治的事情。这就是将工作条件交由国家管理的基础：健康和安全要得到改善和加强，工作日长度应加以限制。

更深层的一个悖论是，社会主义者诉求的扩大民主并不是基于阶级原则，而是基于个人权利的原则。普选权意味着，所有个人在投票的时候都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而非心怀阶级意识。在世纪之交，那些坚持民主的阶级概念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捍卫着那种根据拥有财富多少和个人收入多少分配选票的选举制度，而且他们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尽管社会主义者经常不那么热情地为女性选举权而斗争，但他们却坚定地站在争取真正普选权的一边。

因而，社会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比，更始终如一地捍卫个人民主权利。然而在追求其次要目标的时候，也就是限制工作日，或总的来说对工作条件进行规制的时候，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明确的集体主义